

珠江三角洲农民角色的转化

谭建光

本文根据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的调查资料,分析农民转向农民工,农民工转向现代经营者和职员这种角色的转化趋势及原因。传统农民以自然耕作为主。农民工以体力劳动为主并有“亦工亦农”的兼业性质,其角色转化引起的意识行为变化特征是操作技术性强、时间效率性强、组织纪律性强、集体协调性强。现代经营者和职员是以智力、资金、资源为基础而从事劳动、谋求发展的角色,其意识行为变化特征是自主性强、知识性强、风险性强、成就感强。促使珠江三角洲农民角色双重转化的社会原因包括:自然经济向初级商品经济再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冲击,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影响,经济增长与企业扩张的刺激,外地劳动力大量流入的支持等。

作者:谭建光,男,1960年生,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副教授。

改革以来,中国农民的角色、身分、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作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从70年代末期至今,已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两次大的角色转化。这种农民角色的转化既是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产物,又形成新的因素推动社会经济结构变化。

从1993年起,笔者利用授课的机会,访谈和收集各地有关的统计资料和文献资料,并选取番禺市、深圳市郊的宝安区、珠海市郊的横琴区,以及广东“四小虎”中的中山市、顺德市五个点进行问卷调查,按分层随机抽样方式发放问卷13000份,收回有效问卷9065份,回收率为69.7%;通过问卷分析农民转化的心态变化。

一、农民角色转化过程

第一,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化(1978—1987年)

珠江三角洲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劳动力过剩的矛盾就日益突出。据当时的调查,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东莞等市的农村虽然大力发展专业户、重点户,但仍有50%以上的剩余劳动力。于是,进入城市打工和进入农村工业企业劳动就成为这些人的出路。珠江三角洲各县镇70年代中期建立劳动管理站时,任务是解决人口及回城知青就业,限制、堵截、清退自发进城谋生的农民。然而,到80年代初期,这些机构先后改名为劳动服务站(或劳动服务公司),也承担起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联系企业打工的职责。这一机构功能的扩展,就体现出当时本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急迫性。“六五”期间,珠江三角洲农村劳动力中有60%转向非农产业,其中绝大部分成为城市劳务临时工和农村企业工人。根据资料,大致可将这种农民工分为几类:1、乡镇企业工人;2、外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工人;3、农村个体工场、作坊主及雇工。因为当时的小型个体户大都是二至三人,户主亦是劳动操作者,仍是农民工;4、城镇国

营、集体企业的临时工；5、劳务散工、保姆及其它。这些农民工的特点在于：一是他们在非农产业从事的主要是体力性、操作性劳动。二是他们从事的是企业劳动，而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三是许多人工作之余仍耕作责任田，具有“亦工亦农”性质。

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化，对人的素质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一，操作技术性增强。传统农民依靠经验来指导耕作，现代工人要依靠技术来谋生。农民工在工厂掌握的虽然只是简单的和机械的技术，但毕竟学会按操作要求来制造产品，逐渐懂得技术、技能对自己发展的价值。其二、时间效率性增强。农民工进入企业工作之后，很快改变模糊的、季节性的时间观念，形成日益精确的、计划进行的时间效率意识。笔者在1984年曾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青年(332人)和山区农村青年(431人)作小样本的问卷调查比较，当询问“你怎样评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时：前者赞成的占73.82%，反对的占10.77%，说不清楚的占10.81%；后者赞成的占60.17%，反对的占21.18%，说不清楚的占18.65%。^① 农民工对时间效率观念的认同高于山区农民。其三、组织纪律性增强。有利于改变自由散漫习气，学会服从命令、服从纪律、服从安排。其四、集体协调性增强。农民工在企业劳动所创造的产品，是集体配合的结晶。原宝安县布吉镇在1979年吸引香港老板来办起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时，由于首批“洗脚上田”的农民工不习惯配合与协调，各干各的，使机械化的流水线生产陷入混乱。香港老板无奈之下，决定将资金、设备撤回港。当时的布吉公社领导一方面热情挽留港商，另一方面对农民工进行纪律教育、集体劳动教育、协作精神教育，使生产状况有明显的好转，才保持了外资企业发展的好势头。工厂劳动改变了传统农民“一盘散沙”的状况，使农民工产生集体配合、协调、一致行动的意识。

珠江三角洲农民大规模地转化为农民工，持续到1987年左右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他们通过农副业经营、工业生产、商业活动等积累了资金，不满足于打工者角色，兴起新的创业热潮；另一方面，早期的农民工技术上提高、经验丰富、管理实践成熟之后，往往脱离打工阶层，晋升到新的职位。这样，出现农民角色转化的第二次高潮。

第二，从农民工到现代经营者和职员(1988年—)

改革10年使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1978年至1987年，该地区工农业总产值由70.25亿元增长到316.51亿元，增长了3.5倍，年平均增长16.3%，超过全省13%和全国10%的速度。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5倍，年平均增长20.8%。对此，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卢瑞华指出：“随着我省现代化积累的基本完成，正在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② 据经济学者分析，这种阶段的转变，在珠江三角洲是80年代后期发生，在广东全省是90年代前期发生。同时，农民、农民工向现代经营者和职员的转化，也伴随经济的转型成为日趋普遍的现象。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转化后的角色主要有几类：1. 乡镇企业领导与个体私营业主；2. 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经营人员、技术人员(包括技术熟练工)。因为，改革初期的农村企业规模小、雇工少，就不存在职员阶层与工人阶层的区分。而随着经济发展与生产扩大，工人数量不断增多，企业中的职员阶层就形成了；3. “三高”农业的经营管理者。珠江三角洲近年重新兴起的农业发展热潮，并不是回归传统小农耕作，而是承包大面积农田、水塘进行规模经营，用高投入资金发展高创利、高创汇品种，用企业运行方式雇工种养；4. 金融服

① 参见谭建光：《开放政策与广东青年》，载《青年工作调研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157页。

② 卢瑞华：《放眼未来，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人员。随着农村产业的兴旺,增强了对各种现代服务机构的需求。不少农民,尤其是农村青年就率先开展各种有偿性的“中介”服务活动;5. 投资者、控股者。富裕农村有不少农民将积攒的钱和分红的收入用作企业投资、企业参股;6. 农村基层行政管理者。

农民转化后的各种职业共同之处在于:一是他们主要不是依靠体力劳动,而依靠智力、技术和资金优势去谋生和发展。二是他们有随时改变农民户籍身分的机会。由于小城镇迅速发展,加上户籍制度逐渐改革,富裕农民支付数千元就可获得城镇户口。目前,一部分农民已在城镇购房并转换为城镇户口;另一部分富裕农民是不愿意改变农业户口,因为凭它可获得分红、股息等优惠利益。在深圳市宝安区,协助我们调查的区团委书记陆某,已经是副处级干部,但仍保留在农村的农民户口与身分,这样不仅他可获得每年的农村分红、股息,他的儿子也能得到分红、股息。在珠江三角洲的富裕农村,农民户口已不再是“低人一等”、“二等公民”的标志,而是获取农村经济发展后优越利益分配的特殊身分。三是他们都成为相对独立的主体,而不是农民工那样单纯是被管理、被支配的对象。他们不论是成为工厂经营管理人员或是公司职员、控股人员,都能够独立自主地承担责任、作出决策、处理事务。

珠江三角洲农民超越农民工进入现代角色,其角色意识与行为表现出新的特点。其一,自主性强。在农民工阶段,往往是为谋生所迫,什么活都干,什么岗位都愿意。现在的农民相对富裕之后,找工作并不仅仅是为谋生,而且是为了满足兴趣、发挥潜能、充实人生,因此讲究自主选择职业。调查中,问询“您选择职业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对象的回答是:符合个人兴趣和特长占37.3%,工作稳定占24.3%,能实现个人抱负占12.9%,收入高占11.6%,轻松自由占2.9%,劳动条件好占2.2%,领导开明占1.6%,晋升机会多占0.9%,能迁入户口占0.7%,其它占5.4%。其二,求知欲增强。尤其是独立应付复杂的市场经济竞争对他们的思维能力、知识水平、技能技巧的要求提高。调查对象中,认为自己的知识水平不能满足工作需要而渴望参加业余进修学习人数极多,具体分布是:很想占50.2%,有点想占37.5%,无所谓占6.5%,不太想占3.1%,没想过占2.2%;而他们最希望学习的知识项目是计算机、实用技术、外语、金融财会四类。其三,风险意识增强。我们在番禺市市桥镇“易发商场”对经营进口家用电器批发业务的个体私营主访问调查时,他们讲述了过去经营日用小商品与经营进口电器的风险差异。80年代前期,经销小商品的周转资金是几千、几万元,积压或滞销也损失不大。如今经营进口高档电器,进货一方连着国际市场、港澳市场,受国际经济贸易波动的影响极大;销售一方连着内地广大市场,受国内各省市政治环境变化、经济上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变化、消费者心理变化的影响极大,况且每次周转资金达几百万、上千万元,倘若滞销就损失惨重,但销售顺利则盈利可观。业主们喜欢这种大风险的挑战与刺激,认为能够充分激发自己的潜能。珠江三角洲人大都习惯了风险经营,把盈亏成败视为寻常事情,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其四,成就感强。农民变为农民工时,由于仍是受支配的体力操作者角色,对经营成功、管理成功的了解和体验都不深刻。而现在则对自己判断决策与实施策略所获得的成功感受深切;并且,他们的视野更广阔、机会更多、受到的诱惑更大,其追求成就的愿望非常强烈。

二、农民角色转化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意义分析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珠江三角洲农民之所以能够率先实现角色的转化,从而为全国的农村现代化与农民现代化提供探索经验,是借助了特殊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条件。

第一,自然经济向初级商品经济再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冲击。

珠江三角洲农民,由于处于沿海边境且历史上就有出洋经商的传统,对商品交换、市场经济具有一种亲和性。从对改革开放的反应看,他们对农村“包产到户”、“联产责任制”的热情不如内地农民高涨。最初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是从安徽省、四川省等较落后的地区兴起,逐渐影响全国和普及到沿海地区的。然而,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则是由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率先兴起的。但是,珠江三角洲人很快发现,初级商品经济仍不是发达的经济形态,必须尽快超越。大约在1987年和1988年间,广东人一方面总结改革开放近10年的经验,另一方面大胆探索并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路。这两年有几件意义非凡的事情:一是1988年2月,经过广东的努力争取,中央原则批准了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要求改革开放继续先走一步。如果说,1979年中央批准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行一步,是尝试从计划体制下的自然经济向初步开放的商品经济转化;那么,这一次的继续先走一步,就是试图实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化。广东民众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人善于抓住政策、用足政策,创造了经济奇迹。从1988年至1992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以上;珠江三角洲年均增长16%以上;顺德、南海、中山、东莞“四小虎”年均增长20%以上;为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提供了较雄厚的社会物质基础。二是在1988年1月到12月间,广东省经济学界先后举办6次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问题”的研讨会,公开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与论据。^①研讨会主体报告《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提出:“广东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可以表述为: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一体化,以市场自动调节为主,政府综合调节和促进为辅,使市场全面引导企业。”^②这种提法比党的十三大关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说法是推进了一步。学者们并且深入珠江三角洲,以市场经济理论指导各市县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实践,受到民众的欢迎。三是1987年广东省决定将小珠江三角洲(包括4市12县)扩大为大珠江三角洲(包括8市28县),从而使率先实验市场经济的区域增多了,也加大了经济转型的力度。广东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较快从(计划体制下)自然经济向(有计划的)初级商品经济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跨越,也推动着珠江三角洲农民向农民工再向现代角色的转化。

第二,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影响。

珠江三角洲农村变革和农民角色变化,也得益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中外经济交流影响。这一点,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曾这样论述:“广东人对自己能否实现现代化无论有过什么疑虑,在了解到香港的进步之后,所有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既然香港的广东老乡能够做到,还有什么可以阻止广东呢?更重要的是,香港人不断炫耀他们的经济进步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使广东人对自己的落后状况大为不满,从而行动起来,去追求毗邻的老乡们所获得的一切。”^③珠江三角洲农民对改革开放的热情,一方面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鼓舞,另一方面则受港澳、外国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刺激。最初,人们主要关心港澳、外国的工业化经验和经济繁荣状况,力图学习模仿而摆脱贫困。后来,珠江三角洲农民的视野逐渐扩大,关心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与新兴特点,尤其是注意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深刻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珠江三角洲居民能够直接收看港澳电视、收听港

① 参阅曾牧野主编:《广东改革的经济学思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6页。

② 广东省“市场经济研讨会”编辑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③ (美)傅高义著:《先行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楼可丰、丁安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6页。

澳电台,因此,外国、港澳借助大众媒介所传播的社会经济文化信息很快被三角洲的人们了解、吸收。这次调查发现,珠江三角洲农村居民收视最多的电视新闻节目为:香港台粤语新闻占64.3%,中央台新闻联播占13.8%,本市(县)新闻占8.0%,广东台新闻联播占7.8%,香港台国语新闻占5.1%。另外,他们认为节目办得最好的电视台是:香港翡翠台占66.3%,广东珠江台占8.0%,中央一台占7.4%,香港亚洲台占7.1%,本市(县)台占2.2%,广东岭南台占1.3%。因此,珠江三角洲居民的思维方式、观念心理、行为习惯受到港澳、外国信息的影响而发生一系列变化。

第三,经济增长与企业扩张的刺激。

珠江三角洲在改革10多年来的经济实力增强是引人瞩目的,1980年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9.52亿元,1993年达到2265.29亿元,增长了19倍。从调查点的情况看:深圳市宝安区的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为1.2亿元,1994年达到80亿元,增长了66倍;番禺市的工农业总产值1978年为5.8亿元,1994年达到258亿元,增长了44倍。农村工业经济增长带动和支持了第三产业,使农民可大量向第三产业的职业转化,在金融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中发挥才能。同时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迅速成长扩大。笔者曾到一些闻名全国的乡镇企业去讲课,如顺德市的科龙电器股份公司(原珠江冰箱厂)、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三水市的健力宝公司等,发现这些当年由一二十个人,几千上万元资金起家的企业,主要领导人没变换,当时创业的精神也没变换,但却顺利地发展过渡成为初具现代化规模、数亿元的乡镇企业,大都吸收欧美、日本企业发展的经验,一方面实行制度化管理、规范化管理;另一方面重视企业文化,适应农民重人情、重信任的心理,建立一套互相关心、互相激励的机制。因此,在这类企业中成为经营骨干、管理骨干、技术骨干的农家子弟,既用现代管理规范来约束自己,又用乡土亲情来协调关系。南海市、番禺市的许多从小作坊发展演变而成的大中型个体私营企业,不少当年的农民伙计成为经营管理人员。并且,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对从业者素质要求提高。我们在市桥镇“易发商场”对经营进口电器的个体公司、私营公司调查时发现,80年代中期主要是无业人员、外流农民进入这类公司打工,现在却是许多大学毕业或函大、夜大毕业的青年前来谋职。这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农家子弟,看中私营企业的发展前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企业扩张速度,不仅大大快于内地的速度,而且快于部分发达国家起飞期间的速度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速度,农民角色的转化,就成为历史的趋势。

第四,外来劳动力大量流入的支持。

珠江三角洲目前是国内吸纳外来劳动力最多的地区。首先,外来劳动力不断补充本地劳动力逐渐退出的岗位,使珠江三角洲农民可以及时转向经营管理、协调服务的职业。这种情况在深圳市宝安区与东莞市最为典型。原宝安县从1979年至1992年,常住人口增加0.3倍,暂住人口增加963.9倍,社会总产值由1.9亿元增长为119.4亿元,增加61.8倍。后来,该县划分为宝安区与龙岗区。从宝安区的情况看,1994年总人口中,常住人口占21%,暂住人口占79%,外来劳动力成为宝安区的主要劳动力,分布在所有第一线的劳动岗位上。这种劳动力的替补有个过程:80年代前期,宝安县农民刚刚从传统农耕转向手工业和副业,不论脏活、累活还是重活,只要比农活收入高就干,这时对外来工的吸收容量有限,到1982年,暂住人口仅25000人。到80年代中后期,情况迅速变化,宝安的农民先是让出脏、累、重活的岗位给外来工,随后更是几乎退出所有第一线的体力劳动岗位,由外来工接替,本地人则从事管理工作和经营工作。我们在该区一些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发达的农村调查时,发现有些村的常住人口仅

几十户、一两百人, 暂住人口则近万人, 都是打工仔、打工妹。本地人中却有几十位厂长、副厂长, 还有几十位企业报关员(报关员是负责为外资企业进出口业务而向海关办手续的职位, 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很高, 收入极高)。^① 在珠海市、东莞市、中山市、惠州市等地也普遍出现类似情况。其次, 数百万外来劳动力进入珠江三角洲, 不仅创造了兴旺的劳动力市场, 而且创造了富有潜力的消费市场。一部分本地农民经营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等第三产业, 获得可观的利润。借助这种产业经营实现资金的原始积累之后, 再用来投资有经济前途、有优厚利益、有稳定增长的项目, 使自己成为控股者。我们认为, 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第三产业兴旺, 与外来劳动力的生活消费(还有外来经销人员、业务人员的生活消费)有密切关系。许多镇、村的旅馆业、饮食业、娱乐业在平时非常兴旺, 而到春节外来工大量离开后则极为萧条、生意清淡。所以, 外来人员支撑起来的乡镇消费市场, 为本地农民兴办第三产业, 尝试经营致富提供了机会。再次, 外来劳动力所创造的资金、财富积累, 为珠江三角洲农民实现转化提供了物质条件。作为享受这种经济发展成果的珠江三角洲农民, 获得不断增多的经济收入, 不必为生存而奔波操劳, 才有机会选择适合自己个性与兴趣的职业。以上初步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农民角色转换过程。可以看到, 仅仅 10 余年, 珠江三角洲农民经历了欧洲农民用一两百年才完成的嬗变, 换句话说, 这样迅速剧烈的转变具有某种超前探索的性质。更进一步地研究这种角色转变深层的心理、文化因素, 对于考察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过程的分化无疑会具有启示的作用。

责任编辑: 谭 深

书 讯

△翟学伟著《中国人的脸面观》已由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于 1995 年 11 月出版, 定价新台币 400.00 元。

△王文钦著《新加坡与儒家文化》已由苏州大学出版社于 1995 年 12 月出版。全书 24 万字, 定价 15.00 元。

△王日根著《乡土之链——明清令馆与社会变迁》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 1996 年 5 月出版。全书 26 万字, 定价 16.60 元。

△沈大德、吴廷嘉著《黄土板结——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 1994 年 11 月出版。全书 19 万字, 定价 8.00 元。

^① 参阅谭建光、王义明《外来劳动力与农村工业化的互动关系——对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1995 年第 6 期。